

■纪 念

追忆美学大家宗白华

——纪念宗白华先生逝世 30 周年

□邹士方

朗润园公寓坐落在风景旖旎的未名湖畔,1980年6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哲学系77级几位爱好美学的同学来到这里,拜访我们系的教授——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宗先生在书房接待了我们。先生白发似雪,面色红黑,宁静安详,丰神潇洒。屋子不大,室内光影斑驳,窗前盆花吐芳。书架上排列书籍,伴有几座小型石雕和盆景。东墙上悬挂着油画《蒙娜丽莎》以及几幅西洋风景画、中国山水画和条幅。这一切显示出主人的性格、修养和爱好。82岁的宗教授谈笑风生,兴致极佳。宗先生早年就学于同济医工学堂,他说:“我原来是学医的,但我觉得我终究不适于拿手术刀解剖人的形体,而较适于用理性探索人的内心,就改行钻进了美学。”

宗白华先生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在我国现代美学界,宗先生与朱光潜先生如拱璧双辉、奇峰竞秀。两位美学大师都是学贯中西,但各有所长。朱先生主攻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宗先生在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更多有建树。朱先生是学者风范,宗先生是诗人韵致。五四后期,宗先生著有《流云》小诗集,算得上当时一位有影响有特色的白话诗人。他五四时期参加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和著名理论家。同时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闻名遐迩的四大副刊之一。在他主编《学灯》期间,发现并扶持了郭沫若,促成《女神》的诞生。他介绍好友田汉与郭沫若在日本相识,三人频繁通信,汇成一本《三叶集》出版,风靡一时。1920年至1925年他留学德国,专门学习美学及历史哲学,曾资助过徐悲鸿并与之结为好友。归国后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和中央大学哲学系,担任过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主讲德国哲学和美学。1935年田汉被捕,囚于南京,他和徐悲鸿经过疏通,保释田汉出狱。解放后他一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书桌上那一尊雕刻精美的大型佛头低眉瞑目,秀美慈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请先生讲一讲它的来历。先生十分感慨地说:“这尊佛头是抗战前我从南京夫子庙古董店里偶然买到的,重数十斤,大概是隋唐文物,被人从佛身上切割下来。我十分喜爱。我曾对学生说:我回家只要一看到它,就什么烦恼都消散了。这件事在文化界朋友中传开,大

家纷纷到我家观看和拍照。老友徐悲鸿也交口称赞,爱抚不已。抗战时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前我仓促赴重庆,和妻子只带了几本书逃出虎口,留在家中的珍藏的书籍和资料,包括陈独秀、郭沫若、徐悲鸿、田汉等朋友写给我的亲笔信,都散失殆尽。但没有忘记把佛头埋在院子里的小枣树下。在重庆期间,谈话中常常提及,惘然若失,十分惦念。胜利回南京,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只有佛头还在,我感到由衷的喜悦,逢人便讲。为此我在南京文化界得了个‘佛头宗’的雅号。我的小妹、女作家方令孺还为此写了一篇散文。”从这件事很可以看出他这个美学家的艺术情思。

自然而然就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美学思想,先生十分动情。他说,我国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山顶洞人时期就已经有了穿孔的小石珠等装饰品,说明那时的人类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观念。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美学遗产需要我们研究。中国的美学思想与西方的美学思想有不同的特点,西方古代多侧重于本体论方面,即从主客观方面去讨论美,如柏拉图关于美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关于美的论述;而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则与伦理道德结合得较紧密,所以要研究中国的美学,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史。人类的思想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对于历史上优秀的东西我们今天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呷了一口茶,先生又把话题转到了西方美学史,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是留学德国的缘故,先生特别详细谈论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美学思想。他从康德谈到黑格尔,又谈到马克思:“康德的美学思想很难懂,有人说康德‘只有艺术批评,没有艺术科学’,这话不无道理。黑格尔的《美学》比他的《逻辑》要好懂。黑格尔这个人很了不起,他能够写出那么多的书,构造出那么庞大的体系,实在令人惊叹。这是唯心主义的学说,也是人类思维的花朵。朱光潜先生把黑格尔《美学》三卷全译出来,我佩服他的干劲。马克思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颇有黑格尔的风格,抽象难懂,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但后来正是由于马克思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地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先生略为提高声音,“我还是强调这一点,思想是有继承性



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并不是一片空白。”

宗老加强语气说:“知识是跨民族,跨国界的,是全人类的财富,要从全人类的知识中吸取营养。黑格尔哲学为什么那么宏大精深,就是因为他的学说概括总结了古希腊埃及亚学派到他以前的一切哲学成果。要发展我国的美学研究,我们就要了解世界各国的美学动态和水平。吸收要在消化的基础上吸收,批判要在了解的前提下批判,囫圇吞枣大骂大哄,那不是做学问,是儿戏。”

当谈到有关中、小学审美教育的问题时,宗老认为,一个人幼年、少年时的审美教育与他一生的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美育可以陶冶孩子的情性,培养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小学的审美教育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有着直接的关系,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美育方面,我国有历史传统,有深厚的基础。大教育家孔子的学生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孔子不仅教他们读书,而且教他们音乐、舞蹈、射箭、驾车、礼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学琴、棋、书、画。当然我们的教育同过去时代不同,但我国教育史上的好的遗产我们应该批判继承。我们现在在审美教育不仅限于设置音乐、美术课程,而更多的应是让孩子们去了解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组织他们观看优秀的电影、戏剧,参观各种艺术展览,游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精神,培养他们高尚的审美观和进步的美的理想,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知道我们美的民族传统。北京是文化古都,可以组织青少年多看看名胜古迹、出土文物,这样才能陶冶性情,增加美学的感性知识。当然,在这方面,首先是师资的培养,我们的教师应该具

备多方面的历史和艺术的知识,这样才能对孩子们言之有物。有可能的话,也可在中学开设粗浅的美学讲座课。

我们提起先生过去的论著《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和译著康德美学《判断力批判》《海涅的生活和创作》,以及1979年1月发表的《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当年4月发表的译文《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德国海伦·娜丝蒂兹著)。先生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新近翻译的《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即将出版。他还参与了郭沫若和田汉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

我们问起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先生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四人帮’是一伙权力狂,我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才没受什么大的冲击,只是被分配到清洁队去扫马路。”先生长长叹了一口气,他并不是惋惜自己的遭遇,而是惋惜在这场浩劫中多少老学者、老朋友只能皓首蹉跎岁月,有的甚至死于非命。“浩劫哪,我们黄帝的子孙应当记住,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不能重演!”

时短话长,匆匆间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向先生告别并合影留念。这时,北墙上高处的一幅油画吸引了我们,画面上一位古典欧洲男子披发伫立,若有所思。先生缓缓道来:“这幅画是《笛卡儿像》,是徐悲鸿20年代留法时的临摹作品。抗战时失落。抗战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我在南京夫子庙中发现并以重金购下。后来还给悲鸿,他没有接受,而仍留给我保存至今。我很喜欢这幅画。”我们倾听先生的介绍,在他的眸子里也发现了油画上笛卡儿眼睛里蕴含的那种微妙的东西,一种探索真理的心灵之光。探索美的人的身上闪烁着一种美的光芒,这种美是内在的美、知识的美。

■印 象

唐伯虎虽然名气很大,但他死得早,被我擦肩而过了。作为典型魔羯座,平日子里我很少有不切实际的乱想,实打实的杂事已经把每个小日子塞满,对,魔羯很忙,脑子不够用了。

不过如果偶尔抽空瞎想一下呢?这时候只要一叹息当下男人都已被岁月压榨得又无趣又乏味,那个在银幕上又逗乐又多才的唐伯虎就会跑到眼前活色生香,然后思维再往下延续,荆歌就唐伯虎般慢慢浮上来。除了不知荆歌是否也风流成性爱点秋香之外,余下的很多优点这两人都有点相似:能写,会画,才高七尺五斗。

认识荆歌是在2002年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上。他很高,很瘦,鼻子还很挺括,男人有这些特点,在长相上就不至于太离谱。不过那时我已过了对异性外表敏感的年龄,直至入学二十多天后有一场赴河南焦作的采风活动,路上才算熟识起来。熟识之前,有两件小事让我记住了他。因为是首屈,怎么教育我们肯定让鲁院老师一筹莫展。外面请来讲课的老师常常拖堂,其他人都好孩子似的默默忍着,但全班49个人中,却有一个死活不肯装,这个人恰好脚下有个可翻翘的电插座,他就用脚踩在上面,一下一下,哗啦哗啦,像弹奏打击乐,节奏欢快而扣人心弦。这可以理解为替讲课者伴奏,也可以看成是大胆犯上。课堂上的气氛顿时就活络起来,原来这一刻我们都期待已久了啊。

另一件小事类型差不多,也是在一上午的课被拖出一个大尾巴时,那个人把又长又瘦的胳膊往上一举,奶声奶气地喊:“老师我要小便!”笑声立即涌现,课当然因此很快终止。我们享受着他的斗争果实,欣欣然走向食堂,吃饱喝足,然后很快把他忘到脑后。

这个人就是荆歌。

2002年从秋天到冬天,四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文学杂志、出版社、影视公司一直亢奋地鱼贯涌到朝阳区八里堡,此起彼伏做着同一件事,就是摆宴请客。这导致我们终日奋战于杯盘之间,写稿的激情也在美酒咖啡相伴下汹涌,总之都非常忙。回想起来,那期间与荆歌说话的机会并不多,拢到一起应该都不会超过50句。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曾与我配合,在鲁院一楼大厅打过乒乓球混双,我却毫无印象,这只能说明他球技一般。关于鲁院的乒乓球运动,惟一记住的是元旦时全班有过一场比赛,我拿到女单冠军,这是我乒乓生涯的最后一个荣誉,此后挂拍。荆歌所言混双一事,有可能是事实,也有可能是虚构,这都无关紧要,他高兴就好。

2003年初鲁院组织我们赴延安社会实践,大雪漫天,天寒地冻,火车车厢里哗啦四面漏风,一夜下来,活活就把苏州人荆歌冻感冒了。他一路高烧,女生们一路嘘寒问暖,沉浸在如此香怜玉惜中,他仍不够受用,每天臭着一张苦脸,话不多说,目不斜视。延安主人晚宴时安排了当地歌手演唱,信天游又脆又亮,直抵感动天地之境。轮到我们这边出节目,有女生斗胆上去跳舞,伴奏却卡住了,折腾半天无果。这时候酒桌间忽然高山一耸,是荆歌站起来了,他带着一脸寒光呼啸上前,赫然推开电子琴师,十指按下,音乐流出。

有没有人联想到横空出世的江湖侠客?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电子琴这么拿手,回想起他在课堂上脚踩电插座之举,原来人家根本不是胡踩,节奏感早已千锤百炼过了。

从鲁院散去不久,读到荆歌的长篇小说《鸟巢》,一口气看完,看得太快,导致忘得也快,到现在已经想不起故事的全貌了。大致是几个荒诞人物在一家照相馆背景下发生的荒诞事,究竟多荒诞也模糊了,留在记忆里的除了关于人物命运的几声叹息外,便是那些举重若轻的灵动句子,以及各种信手拈来的奇趣想象了,它们古怪精灵,长一声短一声地喘出一个才华横溢者的不羁之气,风狂雨骤,满纸生辉。虽然以貌取人是陋习(其实未必,就算五官身材多妈给得糟,你连自制气质的能力都没有,那怪谁呢),但以语言看作家一定不会错。一个连语言秩序都无法建立起来的人,他写的就只是字,而非文字。这一点,我服《鸟巢》。算起来这是我读到荆歌的第一篇小说,读完还煞有介事地给他发了个邮件,对结尾的处理提出另一套设想。究竟哪一套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印象中荆歌似乎挺认可的,说了如果再版就这么改,而且版权也只能算我的之类,让我又惊又喜。为什么会惊喜呢?因为这是我迄今有幸遇到的荆歌惟一的一次谦虚。

这个人脾气不好,课堂上踩电插座已能证明。十多年间,彼此没见过几面,气似乎却生过几次——比如我把他拉进鲁院同学微信群,他眨眼又退了;又比如我组织活动没请他前来,他转身就把我微博拉黑了;再比如我策划一套丛书邀他参加,却因为封面没协调好,被他劈头盖脸一阵抢白,利齿像刀片,毒舌完全不打结:……之前曾预告过,哪天写荆歌印象记必须始于控诉终于控诉,好歹把这份仇给报回来。他听到了,却没被吓着,前几个月还是帮某杂志约篇印象记,恰好我正患眼疾,失去控诉的机会。今天突然控起来,却发现都不足挂齿,不过一堆鸡毛蒜皮。

潜意识里我其实一直把荆歌当成朋友,他也处处说我是他朋友。只是我们的友情被山川河流隔得很远,我在这一头,他在那一端。遥望着他头发或长或短地不断变化,人倒不怎么见老,今天晒太阳明天晒画,终日欢喜地编着珠子收藏着古董,得意地一会儿旅居西班牙,一会儿到哪里办书画展,总之小日子过得挺滋润,虽然又嫉妒又痛恨,终究还是觉得是必须的。像唐伯虎那样才气浩荡,却一生落魄坎坷,最后靠卖文鬻画才闻名天下,那都是万恶旧社会的悲剧,我们的荆老师绝不能受这样的二茬罪。

这两天荆歌正在四川成都办画展,路太远,他也没请我去,我便在家悻悻写下这篇之前欠下的印象记,算是送给他画展的花篮吧。虽然你不姓唐,但看上去却很伯虎,很好,你继续,甚至可以再努把力,为所有健在的朋友,活得更珠光宝气。

你不姓唐,但很伯虎

□林那北

■我之见

骑手之于乏驴和野马

□查 舜

但凡有些文学创作经历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体味——创作得心应手时,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品被错误地安顿在一头乏驴背上,快要把人着急死了,它却一直磨磨蹭蹭。思维是那么懵懂而迟拙,笔下是那么木讷而艰涩。好不容易折腾出一篇或几篇所谓作品来,不要说编辑难以认可了,就连自己也觉得没啥意思,但却又心存不甘——没准将它们放在抽屉里,让自己的心绪平静平静,感觉沉淀沉淀,然后再拿出来思量一番,又有新的发现呢。岂知,耐着性子等来的,依旧是索然无味。甚至,就连接着写出的作品也是一路货色。

我一直在想,作为文学创作者,真不该放弃对这样两种现象的分析和总结——倘用时尚话来说,就是务必要理性或科学地对待。于是,我便把前一种现象看作是积极惯性,后一种现象看作是消极惯性。那年,我还在鲁迅文学院创作专业本科班就读,一天中午,在学院大餐厅就餐时,有位同学告诉我,我们对面坐着的那个文友,是一位写过不少脍炙人口作品的大作家,刚刚从国外考察回来。于是,立马引起了我的关注。就餐中,当聊起国外的逸闻趣事时,他居然离开餐桌,边做着夸张性的动作,边用风趣的语言做着令人忍俊不禁的逗白。一时间,学友们都无不被他的开朗、坦荡和幽默吸引。难怪能写出那么有意思、有气势的作品来呢,原来是文如其人啊。

谁知分别仅仅一年多时间,当我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他的近照时,不禁立马怔住了,怎能已是满头白发啊?有位同学告诉我,那是他连连打拼长篇所致。后来,他的多卷体长篇小说获得了全国大奖。人们纷纷感慨不已,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但没过多久,就听到这位四十来岁的青年作家病故的消息。随后,读他的创作谈才知道,他吃了多少常人无法吃的苦,受了多少常人无法受的罪。这也说明,那部作品,是靠超常的意志、毅力和勇气打拼出来的。

没错,没进入积极惯性状态时,是多么渴望能尽早进入那种状态,一旦进入积极惯性状态时,便还有个如何保持和利用该状态的问题。同时,也得用穷究积极惯性密度的办法,抵制、覆盖乃至否并有可能随时窜出来折磨主人的消极惯性。因为积极惯性和消极惯性,并不完全服从于生理或心理因素的管控,倒很在意主人的免疫能力,仿佛也有着浓重的拓展意识和强烈的征服欲望。因而,一旦积极惯性占了上风,就该倍加注意“度”或“分寸感”的问题。

其实,最容易让我联想到这位著名作家的,是近几年来与我关系不错的几位文友的先离世。若按当今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来说,都是正当年,也正是阅历丰富、有了创作经验,最该出好作品的时候。其中一位,几年前,读他的一篇创作谈时,我就禁不住脊背阵阵发凉。他说,当自己把手中的一部长篇小说最终写完,是一天的拂晓。本来,是想松口气的,没想到,握钢笔的那支手,却像痉挛的鸡爪子似的,怎么也伸不开了。还有一位,是我推荐刚加入了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的作者,又一部长篇刚刚付梓,便猝然离世而去。不久前,他的一部作品还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在一些国家发行。

这种现象,最先引起我关注的,是氛围因素对人的心理或性格的影响。这些大多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者,一旦创作起来,之所以投入到了几乎不要性命的地步,莫不与他们世界观形成时期的社会大环境有关?曾几何时,为了尽早完成任务,“宁可少活几十年”的豪言壮语总会响彻于耳。仔细想想,当面对现实感特别强的任务时,用这样的誓言激励或鼓舞人心,也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当从事长篇篇幅的精神劳作时,就该慎之又慎。因为,那是需要用作者的慧根、心血、元气、灵魂乃至体力,生发、浇灌、滋养、护佑和打拼出来的一种特殊生物或生命。

然而,若细心研探,就会发现,并非是那些作家不懂得如何驾驭自己座下的野马,克制自己的疯狂情感,珍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而是经过了轮番的纠结之后,他们像是终于理清了什么是本质意义上的虚实、远近和轻重。尤其,好的灵感一旦闪现,大都是稍纵即逝的,好的创作状态一旦幸临,都是很难再有的。即便还能写得出来,也不再是原来的那种模样和质地了。换言之,成功和失败的分野,有缘和无缘的焦点,往往就在

于时空两大因素好不容易才配合出来的那么一个交叉点上。捕捉住了,就有成功的可能,一旦错过,就不再有了。特别是,长篇小说构思里的各种各样的场景、情节、故事和人物等等,一旦全都争先恐后地和作者套起近乎来,又该是多么感情难却和时不我待啊。

那些曾经驾驭着充满野性和力感之马驰骋在长篇小说创作爬坡道路上的作家们,深知若不趁着坐骑的疯性和冲劲,是很难一鼓作气越过漫漫路途而抵达艺术巅峰的。同时也觉得,即使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全消融和寄托在自己所钟情的作品里,也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而好作品的生命力却是无限的。更何况,创作者的思想情感、艺术追求、写作功力,乃至包括心灵律动和生命气息,都是可以潜移默化在文本之中的。的确,与原来的自己相比,似乎只是换了一种愈加长远、有效而又充满审美意味的存在方式。而如此这般的发现,又怎能不让我们对那些视艺术如生命、将自己的血泪与作品融为一体的作家们感佩不已呢?